

农
民
史
家



农村讀物出版社

閻王
債

农 民 家 史
閻 王 債
本 社 选 編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閻王債 本社选編 吳靜波插圖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門內大街320号)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\frac{1}{2}$ · 字数 25,000

1965年4月第1版 ·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60,000

统一书号: T 3168 · 20 定价: (二)一角一分

农 民 家 史

阎 王 債 逼 命 的 地 租
含 泪 闯 关 东 长 工 苦
抓 丁 仇 万 恶 的 族 权
打 不 赢 的 官 司 夺 地

农村讀物出版社选編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0
定 价：0.11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閻王債	(3)
五块大洋	(11)
十三条人命	(19)
一块核桃餅	(26)
还不完的一石糧	(31)
五十块錢无头債	(38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別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專門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專門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残酷剥削，有的專門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專門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來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過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 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閻王債

一九二六年夏天，我長到十歲，母親把我從外婆家接回興國江背洞大水坑老家來。

這年，母親還不滿四十歲，就被苦難的生活折磨得鬢發斑白，左眼失明了。

每天，天還沒亮，她就披上破大褂，悄悄地上山去砍柴。整天受苦受累，可是家里還是少吃缺穿。我不明白，我家為什麼會這樣窮？母親為什麼會這樣苦？有一天，我纏住母親，要問個究竟，她終於開口了。

“孩子，”她直楞楞地看着我，好久才說：“生下你一個月，你父親就病死了，拋下咱們娘兒倆，拉下了一筆閻王債……為了還這筆債，媽十年來起早搭黑地砍柴賣柴，好不容易積攢了幾個錢，連交地主家的利息還不夠。唉！地主逼債逼得緊呀……”說着就掉下淚來。

“什麼債？”我急問。

“你還不懂事，說也沒有用啊。”母親撩起衣襟揩掉眼淚，“幫媽干活吧！孩子。”

我怕母親傷心，沒有再問下去。打這以後，我就天天跟着母親上山砍柴。柴砍回來，晒好，再挑到江背洞或橋頭去賣。

每回，我們賣得十二三個銅板，母親總是舍不得花，除在

集鎮上称回几斤紅薯或南瓜当口粮外，剩下的銅板，就一个一个放进了小瓦罐里。碰到刮大风，下大雨，上不了山，或者是木柴卖不出去，母亲就去摘些紅薯叶，掺些紅薯煮一煮，让我吃紅薯，自己吃叶子。有时什么吃的也沒有，她宁餓肚子，也不肯花瓦罐里的銅板。好几次，我生母亲的气。我說：

“阿媽，把存的錢花了吧，你怎么这样舍不得？”

“錢是人家的！”母亲总是这样說，“孩子，眼看着就到九月重阳，要債的人又要上門啦！媽怎么敢花一个銅板！”

又是那笔閻王債。一提到这笔債，母亲就唉声叹气。这一天，我又向母亲追問这笔債的来由。

原来，十年前的九月重阳节，父亲因长年劳累，重病去世了。那时，母亲手边沒有一文錢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抱着沒滿月的我，去地主黃盛坤家苦苦哀求，借了三吊錢，买了一口薄薄的棺材，埋葬了父亲。

三吊錢該付多少利息，母亲說不清。只知道每年一到重阳节，地主就上門逼債，拿走了母亲一年苦掙苦攢的全部血汗錢，还說不够利息。付不清的利息要算作本，就这样年年本上添本，利上滾利，这笔債怎么也还不清了。三吊錢欠到第五年，黃盛坤又立了条规定：要母亲在每年的重阳节这天，交清利息，还得請他們吃一顿酒，債才让繼續拖欠。母亲哪里敢說半个“不”字，只得应承下来。从这以后，每年到了重阳节，就成了母亲难过的一关。

十年来，母亲风里来雨里去，起早摸黑，成年劳累，还是吃糠咽菜。三吊錢，象座大山压在她头上，真是一笔閻王債啊！

有一次，我气虎虎地对母亲說：“找黃盛坤算賬去，看到底

欠他多少！”

“你敢！”母亲胆怯地按住我，“人家上通衙門，下連田總，有錢有勢，誰敢去碰他！”

不管母亲怎么唠叨，我越想越气忿。三吊錢，不过值八斗米，为什么还了十年都还不清？为什么越还越没个底？

我开始懂得分担母亲的忧虑了。我想，應該設法帮助母亲还清这笔債，不然永远也沒有安生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卖完柴回到家里，坐下来吃晚饭，母亲对我讲了个小小的打算。她說，要是拿出一部分存錢买只小猪来养，到年底长到百来斤，卖出去，就能換到一笔錢；再把砍的木柴烧成炭，又能多攢几个銅板。养猪和烧炭两头一湊合，到明年的重阳节，就有希望把那笔債本利一起还清了。

一个夏天，在劳碌中度过了。一轉眼，又到了重阳节。这一天，地主黃盛坤穿着白綢长衫，戴着細紗的瓜皮小帽，領着三四个打手，来到我家喝債酒。我母亲忙里忙外地照料他們，把老早准备的鸡鴨魚肉，炒的炒，燉的燉，蒸的蒸，叫我一盤一盤給他們摆上。他們喝了一会酒，上了酒勁，就吆三喝六地猜拳，把饭菜吃了个一干二淨。吃了以后，黃盛坤掏出一块白綢手帕，輕輕抹一抹嘴巴，領着打手到別家去了，留下一个管帳的瘦猴子跟我母亲算利息。

瘦猴子打了一个飽嗝儿，翻翻眼簿，撥拉撥拉算盤珠，翹起两个手指头說：“利息八斗！”

“八斗？这不是同本錢一样多嗎？”母亲吃惊地說。

瘦猴子从牙縫里“哼哼”冷笑两声說：“本錢么，最初是三吊，拖了这十年，就沒法算啦！”



瘦猴子打了一个飽嗝儿，翻翻眼薄，拨拉拨拉算盤珠，
翹起两个手指头說：“利息八斗！”

我冲着瘦猴子大声說：“沒法算也得算。你本錢沒法算，利息怎么算得出？”

这句话刺中了瘦猴子的痛处，他胀红着脸說：“我給你算，我給你算，算！算！”說着，又撥弄起算盘珠子来，然后，把算盘推到我的面前：“今年得归还东家債錢两担七斗粮。”

母亲把我拉到一边，狠狠瞪我一眼：“孩子，你敢招是惹非！”又赶忙掏出瓦罐，把积存的銅板倒出来，但是一数，連利錢都湊不足。母亲求瘦猴子寬缓到底，瘦猴子故意刁难，他端了个竹椅坐下来，說：“东家說了，今年的利錢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”

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火，又冲他大声說：“你讲不讲理？錢叫你們刮干了，連欠几天也不行？”

“就是不行！”他一拍桌子站起来，“东家要不讲理，这笔債肯拖这些年？”

母亲看瘦猴子那副架势，知道多說話沒用，就一狠心，把喂了两个月的小猪杀价卖給人家，才交清了利息。

瘦猴子提着錢袋子走了，母亲一头扑到床上，伤心地大哭了一場。就这样想还清欠債的打算又落空了。

为了还債，为了养活母亲，我想去学篾匠手艺，母亲纏不过我，只好答应了。过了阴历年，母亲到外婆家借了几个錢，做为投师費，选定元宵节这个吉日，領我到桥角头去拜篾匠黃朝桂为师。

起初，黃朝桂什么手艺也不教我，老是叫我挑篾工担，帮打杂务。篾工担同我一样重，跟我的肩膀一般高，挑起篾工担，就得挺着脖子，踮着脚尖，喘着大气。为了学手艺，我咬着

牙，挑着重担跟着师傅各村轉。

跟了黃朝桂几个月以后，我才慢慢摸清他的底細。原来，他不是个正派人，經常在地主家出入，兜攬大批的篾工活計，做上一二十天，賺到一笔錢后，就到处胡搞女人，吃喝賭博。一到錢花光、輸光的时候，他就无缘无故地找我出气。竹板和眼泪，伴着我过日子。我懊悔不該向黃朝桂投師，这个門算是摸錯了。

六月的一天，我們在王山坑做活。晚上，黃朝桂一吃完饭，撂下饭碗就走了。我寻思他不是胡搞女人，就是到赌场去了。乘这个机会，我点起油灯，端到厅堂的角落里，悄悄地学破篾。起先我还有所提防，到后来越破越专心，連蚊虫叮都不管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黃朝桂忽然出現在我面前，他眼珠一翻，雷一般地罵道：“你耗費东家的油，媽的！”接着朝我左膀子上就是一拳。我左手拿着的篾刀，被他一拳打向右手削去，削掉了右手一节食指，鮮血馬上流了出来。我疼得哭不出声，捂着手蹲在地上，額头直冒冷汗。后来，我看到地上那截削掉的手指头，血糊糊的肉粘着白生生的一块骨头，心头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，就一头朝黃朝桂撞去。黃朝桂用手一推，把我推倒在墙角里。我忙滾起身，打算去找那把篾刀，黃朝桂一脚踢开篾刀，順手抓住我的領口，“啪啪”又搊了我几巴掌。

削了指头以后，我再也呆不下去，但又不敢回家見母亲，怕她伤心，只得四乡流浪。

九月間，我流落到茶籽畈。一个好心的篾工师傅邓受桂收留了我，叫我当他的“帮作”，一个月还給我十五个毫子零

花錢，才使我結束了流浪生活。我真是說不出的高兴，心想：世上也有这样的好人啊！

在茶籽畈邻近的几个村子里，人人都說我师傅忠厚公道。他走到哪一村，就受到哪村人的欢迎。后来，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主席。
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我听从邓师傅的話，参加了儿童团。

一九二八年的冬天，茶籽畈邻近的各个村子，都火騰騰地鬧起革命来。不久，就成立了区、乡苏維埃政府。农会把地主和祠堂的土地，都分給了沒地或少地的农民。

第二年的春节，师傅叫我回家跟母亲过个欢喜年。我一到家門口，就高兴得大叫：“阿媽！”母亲赶忙迎出来。母亲也变了，穿身暗蓝色的新布褂，布滿皺紋的脸上，露出欢喜的笑容。見了我，不知說什么好，一把拉我坐下，从鍋里端出一盤热騰騰的年糕，摆在我面前，指着說：“孩子，吃光它！”

“我們家也蒸年糕啦！”

“孩子，几个月来，媽好象隔了一世，誰想到天下变得这么快！”母亲擦着眼泪說：“家里分到十四亩田，还分到一块茶山。”

“好啊！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才有好日子过！”我情不自禁地高声說着。

母亲見我这股高兴劲，也呵呵地笑起来。

“孩子，”她一把拉我走回房去：“那笔閻王債，已經抗掉啦！三吊錢害得我牵腸挂肚十几年，沒想到今年冬天，一笔勾消了。”接着，母亲又談起农会，說农会的人会讲道理，处处替穷人办事。她还問我：“听人說，茶籽畈的农会主席是你的

师傅?”

“是啊，就是邓师傅！”

母亲乐得直拍手，說：“这我就更放心了，你要听他的，向他学着点！”

我跟母亲欢天喜地过了个翻身年，又回到师傅那里。

一九二九年十月初，我得到了母亲和邓师傅的贊同，参加了光荣的紅軍，在党的領導下，为劳动人民打天下。

黃朝天

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《血和泪的回忆》

五块大洋

每当我在鏡子里看到头上那九顆戒疤的时候，就不由地回想起二十多年前，我家因为借了地主五块大洋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情形。

我的老家住在四川省遂宁县石洞場旁边的一个桥洞下。爷爷从八岁起就給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地主廖子章当长工。有一年，奶奶患重病，危在旦夕，爷爷向廖子章借了五块大洋，給奶奶看病。奶奶的病沒治好，还是死了，可这五块大洋，却利上滚利，成了我家世代还不清的閻王債！爷爷脸朝黃土背朝天，整整給廖家苦干了四十年，直到六十岁断气那天，这笔債不但沒有还清，反而越还越多，由五块錢滾成了一百五十块。爷爷死了，从小在廖家放牛、打杂的爹爹接着給廖家扛长活。他吃的是殘湯剩飯，睡的是牛棚草窩，一年到头在水田里跟稀泥打交道。夏天，火热的太阳烤得身上冒油；冬天踩着冰碴犁田，冷彻骨髓。日子一久，爹得了严重风湿病。地主見爹什么也不能干了，就一脚踢开，說：“回去养好病再来吧！”

养病，拿什么养！家里連做口稀飯的米也沒有。爹回到家来，四肢瘫痪，終日臥床不起。我这时刚六岁，一家四口人，全靠媽給人家做点零活、十岁的姐姐拾些柴卖錢來維持。两年以后，爹的病稍好了些，能起来走路了。看到一家人沒吃沒

喝，老婆、孩子成天还要为自己操劳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也勉强和我们一起上山去打柴，挑柴上街卖。有一天，爹在街上卖了柴，正从买主手里接过几个铜板的时候，被廖家的狗腿子看見了。他們上前說：“姓尚的，生意不錯啊！賺了一笔大錢吧？廖大爷說，‘要是你拿得出来，就早点把賬还了，不要一拖再拖了。’”爹沒好气地說：“我爹干了四十年，我又干了三十多年，廖家分文沒給，賬沒还了，反而越来越多，这是什么狗屁賬！”狗腿子說：“那是有賬为凭的呀！你給大爷干活，只能頂利，可是五块大洋的本一直沒还啊！这样吧，你去当着大爷对证一下吧！”那帮家伙，不容分說，連推帶拉，硬把爹弄到廖家去了。

爹一去就被扣下了。廖子章把爹弄到磨房里去推磨。一个病人哪干得了这样重的活！爹經常暈倒在地上。有一次，暈倒在磨盘上人事不省。地主的大儿子看見罵道：“你这老狗，裝死！”上去就是一陣拳打腳踢。爹倒在地上，口吐鮮血，一动也不动。人已經死了，可是廖子章的大儿子还破口大罵：“你他媽的还不起来給我干活？”說罢，拿了一根手腕粗的鋤把，照准爹的肋骨又是几下。可怜的爹爹，就这样被折磨死了！

我們家离廖家有三十多里远。直到爹死后第三天，我們才从廖家一个姓袁的放牛娃那里听到爹死的消息。媽和姨父連夜跑到廖家，爹已經被埋在一个乱竹林里。刨出来一看，只見爹身上到处是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。媽哭得死去活来，爹死得好苦好冤呀！可是，那时候的衙門是替有錢人办事的，我們穷人有苦无处訴，有冤无处伸。媽也只好含冤忍辱和二